

微型社区研究的范本

——《江村经济》再读*

韩蕾蕾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江村经济》(英文名《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作者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该书1939年在英国出版,其微型社区研究开启了文化人类学的新篇章,被列入“国际社会学丛书”。

[关键词]《江村经济》;理解文化;微型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3-0105-02

一、《江村经济》简介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作者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此书自1939年在英国出版后多次重印,列入“国际社会学丛书”,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之一。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因该书在人类学上的成就而授予费孝通赫胥黎奖章。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冶金及中国的土地问题。另有人类学家B. K. 马林诺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B. K. 马林诺斯基对这一研究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敢断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考察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做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2]该书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了解中国农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

二、对《江村经济》的认识

首先,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社会人类学开创了新天地。传统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

与野蛮,而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这一特性使得人类学“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如英国社会人类学者到英国各殖民地去研究当地的“土著民族”,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则主要研究分布在北美的印第安人,后来扩大到拉丁美洲的“土著民族”。但是,“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费孝通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一员,在本乡本土进行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的农村,也就是离开了欧美人类学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了对先进民族的研究,在研究的方法上跨越了一大步,也证实了马林诺斯基的预言:“未来人类学的研究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稗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3]

其次,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去理解文化,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教给我们一种理解文化的方法——“主位”和“客位”的观察方法。“主位”是指被调查者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分类和解释。“客位”是指调查人员等外来者对事物的看法、分类和解释。对同一事物,两者看法可以截然不同。例如,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一个部落的牛群,雄性死亡率总是高于雌性。当地人民认为“公牛生来体弱”,调查者则发现是因为小公牛出生不久,即不许停留在母牛的旁边吃奶所致,实际上成为当地在

* [收稿日期]2007-03-07

[作者简介]韩蕾蕾(1983-),女,贵州省织金县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民族学院,研究生。

不好杀牛禁忌下淘汰雄性保证雌性存活率以便牛群更好繁殖的一种机制。又如《江村经济》中“溺婴”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的三、四十年代,农村中的“溺婴”是比较严重的,很多人也许会认为那是传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在作怪,往往把“溺婴”看成是农村中重男轻女观念的反映。实际这是与农村中土地资源的紧缺分不开的。通过费孝通的考察,江村现有的土地已受到相当重的压力,这是限制儿童数量的强烈因素。因此,在观察各种文化现象时,切忌单方面的考虑,应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使“主位”和“客位”得到有机结合。

第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地考察的方法。实地考察就是深入到调查现场,利用参与观察与观察访问、座谈等方法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以便对调查对象做深入解剖分析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在人类学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4]费孝通运用实地调查方法开展社区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获得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写出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一批著作。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坚持的仍然是实地调查,“我紧紧追随我们民族在本世纪内的现代化过程,一边调查,一边记录,以便认识它,思考它。”^[5]“我一生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认识中国社会,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趋势。”^[6]在《江村经济》一书,费孝通运用了多种调查方法:宏观与微观、主位与客位、参与观察与访问、座谈与走访等,体现了多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为民族学者在社会实地调查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最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从微型社区研究入手,以资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概况。费孝通的目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7]这就需要微型社区的研究方法,“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

究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有实际的基础自然容易加以观察和叙述。”^[9]江村作为一个微型社区,是费孝通整个学术旅程的开端,通过这个社区只是部分地了解中国农村社会,要全面地了解中国农村,就必须寻找不同的农村类型进行调查,用类比法,“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10]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就是通过一个个的微型社区的深入研究而获得的。

总而言之,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通过朴实无华的语言,从社区经济着眼,用实地调查的方法,通过微型社区反映广阔社会,不仅创新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启了民族学研究的新篇章,而且还给人以美的享受。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代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对于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典型的职业描述以及完美的农历节气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11]

[参考文献]

- [1][2][3]费孝通.江村经济[M].商务印教馆.2003.1.2.15.
 [4]费孝通.费孝通选集·小城镇大问题[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323.
 [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淄博行(第13卷)[M].群言出版社.1999.43.
 [6]费孝通.东亚社会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28.
 [7][10]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社会调查自白(第10卷)[M].群言出版社.1999.34.35.
 [8]费孝通.费孝通文集·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第8卷)[M].群言出版社.1999.165.
 [9]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4-5.
 [11]费孝通.江村经济[M].商务印教馆.2003.17.

(责任编辑:杨 睿)

A famous book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navigation of miniature community study

—After reading JiangCun Economy

HAN Lei—l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Nationalit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JiangCun Economy, whose English name is Peasant Life in China, was Fei Xiaotong's doctoral thesis, which was written in 1938 at University of London.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east China and Kaixiangong Village at south bank of Tai Lake, Fei Xiaotong described the system of Chinese peasants' consumptio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trade and so on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economic system and specific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y.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in England in 1939, its miniature community study has initiated a new chapter of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it was included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Collection.

Keywords: JiangCun Economy; understanding culture; miniature community